

大数据视角下的 制造业税收指数构建与应用

钱斌华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宁波城市职业技术学院优秀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大数据视角下的制造业税收 指数构建与应用

钱斌华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数据视角下的制造业税收指数构建与应用 / 钱斌
华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9. 6
ISBN 978-7-308-19218-7

I. ①大… II. ①钱… III. ①制造业—税收管理—
研究—中国 IV. ①F812.4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113691 号

大数据视角下的制造业税收指数构建与应用

钱斌华 著

责任编辑	石国华
责任校对	王建英
封面设计	刘依群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星云光电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 刷	虎彩印艺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80 千
版 次	2019 年 6 月第 1 版 2019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9218-7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市场运营中心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cs.tmall.com>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前言

对经济态势进行判断、做适当预测,是政府部门在经济工作中合理把握经济走向、出台政策的前提和先决条件。

长期以来,统计部门通过自下而上的汇总、抽样调查等手段,建立指标和模型,得出指数化的计算结果并权威发布。这是一种严谨的方法,但耗时耗力,所得结果有时还可能与社会公众的感受不完全吻合。

大数据的出现,为判断预测经济运行提供了新的可能。通过对已经产生的海量经济运行数据进行深入挖掘,我们完全有可能准确地把握经济态势,科学研判经济走向,从而为出台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互联网+税务”行动的大背景下,本书以税务大数据为基础,构建了反映税收与制造业互动的制造业税收指数,并与统计部门发布的 PMI 做了相关性分析,发现该指数在判断和预测制造业运行方面具有很好的优势,可为税务部门和相关部門做决策提供科学严谨的判断依据。

钱斌华

2018 年 12 月

目 录

第1章 绪 论	(1)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
1.2 研究范围	(1)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2)
1.4 章节结构	(3)
1.5 理论基础	(3)
1.5.1 杠杆理论	(3)
1.5.2 减税理论	(4)
1.5.3 竞争理论	(4)
1.5.4 凯恩斯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理论	(5)
1.5.5 拉弗曲线理论	(6)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制造业的机制及经验借鉴	(10)
2.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10)
2.2 税收政策对制造业的影响机制	(11)
2.2.1 税收政策影响供给从而影响制造业	(11)
2.2.2 税收政策影响需求从而影响制造业	(12)
2.3 税收助力制造业的国际经验	(12)
2.3.1 降低企业税负方面	(12)
2.3.2 扩大内需方面	(13)
2.3.3 促进产业结构调整方面	(13)
2.3.4 增加投融资方面	(14)
2.3.5 推动企业创新方面	(14)
第3章 宁波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	(16)
3.1 宁波制造业现状与发展举措	(16)
3.1.1 宁波制造业现状分析	(16)
3.1.2 宁波制造业的发展举措	(18)
3.1.3 宁波其他与制造业相关产业的现状分析	(21)
3.2 宁波制造业税收分析	(23)
3.2.1 从税收总量来看:税收增长引擎稳固,潜力巨大	(23)

2	大数据视角下的制造业税收指数构建与应用	
3.2.2	从行业分布来看:产业集群效应显现,转型起步	(24)
3.3	现行制造业税收优惠政策、成效及存在问题	(27)
3.3.1	现行制造业税收优惠政策	(27)
3.3.2	宁波制造业的税收激励政策效果分析	(29)
3.3.3	现行宁波市制造业税收激励政策存在的问题	(32)
第4章	制造业税收大数据应用	(34)
4.1	大数据分析的积极作用	(34)
4.1.1	有助于实现政策评估智能化	(34)
4.1.2	有助于实现风险管理智能化	(35)
4.1.3	有助于实现纳税服务智能化	(35)
4.1.4	有助于实现税务监督智能化	(35)
4.2	指标的选取原则	(36)
4.2.1	经济和税收重要性原则	(36)
4.2.2	统计充分性原则	(36)
4.2.3	指标协调性原则	(36)
4.2.4	对经济和税收的变化敏感性原则	(36)
4.3	制造业税收指数的具体构建	(36)
4.3.1	关于税收治理能力的评价指标	(37)
4.3.2	关于税收指标与经济指标的计量关系研究	(39)
4.4	制造业税收指数的计算	(43)
4.4.1	数据预处理与缺失值填补	(43)
4.4.2	数据标准化处理	(50)
4.4.3	赋指标权重	(51)
4.4.4	合成制造业税收指数	(69)
4.5	制造业税收指数与PMI相关性	(74)
4.6	对未来季度的税收与经济预测判断	(76)
4.6.1	制造业税收指数的平滑处理	(76)
4.6.2	未来月度的制造业税收指数计算	(82)
第5章	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建议	(83)
5.1	发挥现有政策优势,以推动制造智能化为主干线	(83)
5.1.1	进行税收优惠试点,打造示范引领效应	(83)
5.1.2	对中小企业设置特殊倾向创新优惠政策	(84)
5.1.3	完善现行优惠政策,堵漏解困提升实效	(85)
5.1.4	加大对“产学研”协同创新的支持力度	(85)
5.1.5	重视对制造业企业科研人员的税收激励	(86)
5.2	立足经济税源根本,以推动制造高端化为动力线	(86)

5.2.1 降低高端制造税负,继续税制改革	(86)
5.2.2 鼓励优势兼并重组,增强出口后劲	(87)
5.2.3 强化企业主体地位,深化简政放权	(87)
5.2.4 基于纳税信用等级,共建企业联盟	(87)
5.2.5 不同税源分类引导,提升制造质量	(88)
5.3 强化税收职能发挥,以推动制造信息化为导向线	(88)
5.3.1 工业物联网和互联网建设,实现企业信息大共享	(88)
5.3.2 加快信息技术改造,完善基础设施建设	(88)
5.3.3 完善信息建设,提供定制化服务和管理	(89)
5.4 渗透持续发展理念,以推动制造绿色化为趋势线	(89)
5.4.1 税收优惠促进节能环保技术研发	(89)
5.4.2 “绿色增值税”差异化返还试点	(90)
第 6 章 结论与展望	(91)
第 7 章 附 录	(92)
7.1 支持转制升级的税收优惠政策	(92)
7.2 支持文化体育事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98)
7.3 支持“三农”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120)
7.4 支持金融资本市场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130)
7.5 支持节能环保的税收优惠政策	(150)
7.6 鼓励高新技术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163)
7.7 改善民生的税收优惠政策	(173)
7.8 促进小微企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213)
7.9 促进区域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	(218)
参考文献	(223)
致 谢	(228)

第1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2015年,伴随着《中国制造2025》战略的出台,我国全面吹响了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加速高端制造业发展的号角。这既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在发达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双向挤压”背景下,被动实现产业升级的战略转型;也是中国在外需受阻和资源约束条件下,主动从供给侧端入手,实现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产业高端化,适应经济新常态的战略安排;更是中国创新驱动攀升到产业链高端,促进产业向中高端迈进,挺起大国脊梁的战略选择。

制造业是现代经济的基石,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一个国家或地区制造业的发展水平往往能体现其经济发展程度、生产力水平和综合实力。宁波——长江经济带的两只“龙眼”之一,作为一个以临港重化工业和传统制造业为主的港口城市,2016年8月,成为全国首个“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2017年3月,宁波市出台《推进“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了22条精准扶持政策,3年内总扶持资金将超过130亿元,不断为实体经济发展“添柴加火”。

税收政策的导向和力度对制造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税收政策主要通过作用于制造业的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品生产以及产品销售等环节发挥其影响作用,但目前我国支持制造业发展的财税政策不多且影响力不大,亟须出台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税收政策,并保证政策的可操作性;对于制造业税收政策的研究将有利于补充、完善现行财税政策体系,建立并完善适应制造业发展的、顺应技术进步和经济结构调整总体趋势的税收政策体系,充分实现研究的实际应用价值。

1.2 研究范围

本书的研究涵盖传统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传统制造业发展到现在,已经有明确的定义和统计口径,数据收集和规整有着较为严谨的范围。然而迄今为止,学术界对高端制造业还缺乏统一的界定,更缺乏明确的统计分类标准。从资料搜索可见,学界一般较为认可的是:高端制造业指制造业中的高端环节,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工业发展到后期或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产物,既包括传统制造业的高端部分,

也包括新兴制造业的高端部分。高端制造业与传统制造业的主要区别是:传统制造业主要依靠传统工艺,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不高,劳动强度大,大多属于劳动力密集型或资金密集型产业;高端制造业主要依靠高新技术和高端装备,大多属于资本密集型或技术密集型产业。高端制造业可以是利用新技术发展起来的新行业,也可以是采用先进技术改造提升传统制造业。从制造业呈现出的绿色化、智能化、服务化发展趋势看,高端制造业基本上包含了先进制造业和服务型制造业。

我们认为,高端制造业的概念可以从行业和产业链两个角度界定。从行业角度讲,高端制造业指制造业中新出现的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强竞争力行业;从产业链角度讲,高端制造业是处于产业链高端环节的制造业,这些高端环节可以看成制造业的细分行业。

这一定义,凸现了高端制造业技术含量高、价值高、资本投入大、附加值高、控制力和带动力强的特征。技术含量高是指高端制造业体现多学科和多领域高、精、尖技术的集成,具有知识、技术密集等特征。价值高指高端制造业在产业链中处于高端地位,其发展水平决定产业整体竞争力。资本投入大原因有两个:一是高端制造业的核心技术往往研发难度大、工艺复杂,攻克这些核心技术需要高额研发费用;二是生产所需仪器、设备、材料本身具有较高价值,需要较高的购置费用。产品附加值高是由于高端制造业产品体现了先进技术、先进生产设备等方面的价值。控制力强是指高端制造业相关企业在产业链中处于控制节点位置,具有一定垄断特性,能够影响其他企业的行为。带动力强是指高端制造业企业拥有先进的技术设备和较强的创新能力,可以对上下游企业产生技术辐射,从而对整个产业链技术创新和竞争力提升都具有较强带动作用。

本书正是基于以上判断,按此口径,对传统制造业和高端制造业的数据进行选取。数据以宁波为样本,时间跨度为 2011—2017 年。

1.3 研究方法与创新点

本书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

(1)学科交叉研究。本书将税收与区域经济学、管理学和产业经济学融合在一起进行学科交叉研究,在研究中注重对信息的综合处理和分析,希望通过这样的交叉研究建立一个能推进制造业发展的新视角,并希望发掘影响制造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特殊性。

(2)比较研究。本书运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对同时期国内外有关制造业发展的税收政策进行比较。

(3)经验分析。本书的研究建立在对大量数据进行经验分析的基础上,通过对历史数据的深入挖掘和规律总结,为论点论据提供有说服力的证明。

本书在以下方面取得了一定的创新:

(1)阐述了促进制造业发展的税收政策作用机理。从制造业的要素供给市场和产品需求市场入手,通过市场失灵所包含的外部性、公共物品的特性,强调政府实施税收政策的必要性。

(2)对政策的分析和检验贴近现实。突破以往研究中对某项政策工具的孤立性研究,本书利用各项税收政策工具的运用具有叠加性的特点,对各种政策工具进行综合性研究、从比较中分析各项政策工具的效果,相对以往对单项政策工具的孤立性研究更能接近客观现实。

(3)采用了定性分析加定量分析的研究方法。以制造业为主线,把税收政策渗透到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创新资金支撑服务、人力资源保障、社会环境服务等方面,并对协调机构的组织构架和运行规则做出具体设计,提高了研究结果的可操作性。

1.4 章节结构

本书共分7章,各章结构如下:

第1章“绪论”,阐述本书写作的背景和意义,对研究范围做界定,阐明研究的方法和创新之处。

第2章“税收政策影响制造业的机制及经验借鉴”,通过大量的文献检索,对国内外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税收大数据与政策研究理论进行综述,对税收支持制造业发展的作用机理和作用方式进行分析。

第3章“宁波制造业发展现状分析”,以宁波为例,对宁波制造业的现状、运行特点、具体支持手段和新型产业的运行情况进行分析,并对支持制造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进行分析。

第4章“制造业税收大数据应用”,采集2011—2017年的制造业税收大数据,通过建立经济学模型,合成统一的制造业税收指数。将该指数与PMI进行相关性分析,验证有效性,并对未来月度的制造业税收指数进行预测判断。

第5章“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建议”,从把握机遇增强意识、加强大数据挖掘利用实现精准施策、健全体制提升制造业能级和聚焦重点领域增强制造业发展动能等方面,给出切实可行的推进制造业发展的对策和建议。

第6章“结论与展望”,对全书研究进行总结,并提出进一步研究的展望。

第7章“附录”,列出了与制造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

1.5 理论基础

1.5.1 杠杆理论

税收杠杆是国家采用税收的形式间接调节经济活动,以顺应宏观经济计划的要求。具体是对纳税人采用不同的税收征管方法,依据税法设置税种、设计税率、

采用减免退税等方式,以此来激励纳税人从事相应的经济活动,引导纳税人制定相应生产经营决策。税收杠杆主要的功能是调节作用,可以对市场经济机制的缺陷进行修正和弥补,以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积极作用。税收杠杆特点有三个:一是法律强制性;二是调节范围大;三是调节的灵活性强。

政府通过税收手段引导制造业转型升级,从而推动经济的快速发展。从宏观的角度看,政府利用税收杠杆理论,对制造业采取有针对性的各项税收手段,为制造业转型成功奠定坚实基础,税收优惠政策从各个方面给制造业提供支持,鼓励其转型发展壮大,最终会撬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从长远考虑,税收政策促进制造业稳固发展进而带动整体经济运行,对目前低迷的市场经济产生强有力的促进作用,并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整体经济的把控起到关键性调节作用。

1.5.2 减税理论

减税就是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给予企业减免税。结构性减税,区别于普遍大规模的全面减税,是政府为了达到特定目的、针对特定对象对特定税种实行的税负减免,而不是对所有税种采取“一刀切式”的减免。该税收减免理论在2008年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自此以来,我国政府采用了诸如取消农业税以及增值税改革等结构性减税措施,以优化税制结构、促进经济增长、降低企业纳税人实际税负为落脚点,鼓励企业发展,调节市场经济结构。

减税能带来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影响企业对投资和消费的选择。一种是当降低税率时,企业的税后利润增加,会改变企业的投资和消费决策,以得到最高的效益,这可以理解为收入效应。另一种是税率下降,用税率表示的投资相对价格降低,意味着投资收益率增加,从而企业会加大投资力度,缩减消费的支出,形成投资替代消费的效应。

税收政策是财政政策的一个重要政策工具,政府为了促进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经济发展,对制造型企业涉及的税收方面采取减税政策,力求从实际上降低企业税收负担,引导企业转型升级。如支持技术研发创新活动,对研发费用提供优惠政策,鼓励制造业使用先进技术,走智能生产的路线;通过税收优惠政策促进第三方降低贷款门槛,解决企业融资困难,从而加大资本对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投入力度,提高技术和产品的更新换代速度。

1.5.3 竞争理论

竞争理论起源于生物学,后也被应用于市场经济,并发展成多方面各层次竞争理论,其中演进派认为竞争是可以实现变化、促进进步和创新的。社会通过不断竞争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并与此同时产生各种规则。其代表人物哈耶克曾提出“竞争有利于制度的创新”。而制度创新主要体现于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其中强有力的竞争手段就是税收竞争。政府通过税收优惠政策吸引资本的流入,对自身经济和财政的发展起到促进作用,所以税收竞争更容易实现产业或政策的转型,从而形成更为完善的经济模式。

当然企业之间也存在着竞争性,已经转型升级成功的企业必定会更加具有竞争实力,在企业的运营上将会占据绝对优势,随即促使更多的企业争相效仿,一定程度上为政府推行政策提供便利,在政府与企业的相互促进中完善企业结构,促进政府对市场进行调节和管控。

1.5.4 凯恩斯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理论

1929年,由美国爆发的经济危机席卷了全球,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产品积压等问题严重,古典经济学受到了严重质疑,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陷入崩溃的边缘。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凯恩斯主义应运而生,成了解决经济危机,恢复经济发展的一味良药。凯恩斯等一批学者主张国家积极干预市场经济,建议增加财政支出和降低税负,刺激国内投资和消费需求,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凯恩斯学派认为,投资和消费等有效需求不足,导致了经济萧条,同时导致社会财富分配不公,结果是少数人掌握过多的社会资源,却缺少投资和消费的意愿,进一步使经济恶化。因此,凯恩斯学派认为应由政府出面干预,扩大政府支出规模,发展社会公共事业,增加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就业保障,同时利用税收收入分配功能,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税收负担,从而给予社会更多的流动资金,促进企业投资和居民消费,最终恢复经济发展。

在凯恩斯的经济税收理论的基础上,萨缪尔森做了进一步补充。他认为国家的税收可以进行自发调节。在实行超额累进税制时,税收会在经济上行时自动增加,以抑制经济过度繁荣;在经济下行时自动减少,以促进经济迅速恢复。这就是经济的“自动稳定器”功能。而当国家主动干预经济发展时,就会发挥经济“人为稳定器”功能,通过采取不同的财政措施对经济进行人为调节。当经济过热时,国家会增加税收来抑制需求的过度膨胀;而当经济低迷时,国家会降低税负,保证个人和企业有更多的收入增加和资本积累,以扩大投资规模和刺激消费需求,从而实现经济的快速恢复和增长。

为了更加形象地描述凯恩斯的税收与经济增长的理论,可以税收乘数理论的模型来做说明,看经济变动如何随税收变动而变动。凯恩斯学派的经济理论是以封闭的三部门经济为研究对象的,因此可以只考虑居民、企业和政府而不考虑进出口,同时为了更全面地研究税收对经济的影响,将定量税和比例税同时考虑在内。

利用收入法对国民收入进行核算,得如下等式:

$$Y = C + S + T$$

利用支出法对国民收入进行核算,得如下等式:

$$Y = C + I + G$$

以上两式中, Y 代表国民收入, C 、 I 、 S 分别代表消费、投资和储蓄, G 代表政府购买, T 代表税收。下面对消费 C 和税收 T 分别作进一步展开。

$$C = \alpha + \beta Y_0$$

$$T = T_0 + tY$$

$$Y_0 = Y - T + t_r$$

以上三个式子中, α 、 T_0 为大于 0 的常数项, β 、 t 为大于 0 的参数项, T_0 代表定量税, β 和 t 分别代表边际消费倾向和边际税率, Y_0 和 t_r 分别代表可支配收入和转移支付。

根据均衡国民收入的定义, 对上述各式进行整理和推导, 可得:

$$Y = \alpha + \beta[Y - (T_0 + tY) + t_r] + I + G$$

对上式进一步整理可得:

$$Y = \frac{\alpha - \beta T_0 + \beta t_r + I + G}{1 - \beta + \beta t}$$

为了分析税收变动对经济变动的影响, 求 Y 对 T 的偏导数, 可得:

$$\frac{dY}{dT} = \frac{\beta}{1 - \beta + \beta t}$$

可见, 税收变动与经济变动方向相反。税收负担过重, 会阻碍经济发展, 只有税负适当, 才能促进经济增长。

1.5.5 拉弗曲线理论

拉弗曲线理论由阿瑟·拉弗提出, 为供给学派的代表学说, 主张通过降低税负来增加社会供给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拉弗曲线实际上描述了税率变动对税收的影响: 二者呈一种倒 U 形的关系, 说明存在一个税率拐点, 该拐点对应的税率是最优的。当低于该拐点税率时, 提高税率会增加税收收入; 在达到拐点税率时, 税收收入最多; 超过拐点税率时, 继续提高税率会减少税收收入。因此, 税率存在上限, 不能无限提高, 否则税率过高甚至接近 1 时, 就会加重人们的税收负担, 降低工作积极性。企业由于成本的增加, 会缩减其生产量, 产出就会减少, 人们收入也会下降, 税收的来源又不能得到及时补充, 税收收入必然会减少; 而税率较低时, 人们就会因为自身税负较轻而具有很高的工作积极性, 以获得更多的劳动所得, 同时由于生产成本降低, 企业会扩大投资规模, 增加税源范围, 进而增加税收收入。因此, 只有在不超过最优税率时, 才能保证税收和经济共同增长。

政府为了履行社会职责而必须有一定的财政收入作为支撑, 也就是政府收入。而社会收入 Y_s 除了包括政府收入 Y_g 外, 还包括居民收入 Y_p , 可用一个数学表达式来表示三者之间的关系:

$$Y_s = Y_p + Y_g$$

政府收入是对社会总收入的分配所得, 也即征税而来。假定征税按照一定的税率 t 来进行, 那么政府收入可表示为:

$$Y_g = Y_s \times t$$

由上述两式可得居民收入为:

$$Y_p = Y_s \times (1 - t)$$

只有居民参与生产活动, 社会收入 Y_s 才能被创造, 也才有了政府收入 Y_g 。从出于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出发, 居民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的意愿取决于可预期的未来收入的大小, 也就是 Y_p , 而税率 t 关系到居民所能获得的扣除税收后的剩余财富的

大小。因此,较高的税率意味着居民承担较重的税负,所获得的收入就会减少,必然会挫伤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社会收入,进而减少政府收入。

既然居民的生产积极性与最终社会收入密切相关,不妨假设前者对后者有直接影响,那么居民生产积极性越高,社会收入越多。当居民生产积极性达到最高时,社会收入也就最多,令其为 Y_0 。我们知道,税率的高低直接关系到居民收入的大小,也就间接地影响到居民的生产积极性。当税率 $t=0$ 时,居民税收负担为 0,此时,居民生产获得的收入完全为己所有,居民的生产积极性最高,社会收入最多;而当税率 $t=1$ 时,居民收入完全用于税收的支付,居民收入为 0,居民参加生产的积极性最低,社会收入为 0。

如果用社会收入与最大产出的比值 Y_s/Y_0 作为衡量居民生产积极性的指标, 因为 t 代表政府收入的比重, 居民收入的比重则为 $1-t$, 不妨将 $1-t$ 称为社会收入分配给居民的“留率”。“留率”越大, 表示居民能够获得的收入也就越多, 进而有越高的生产积极性, 假定随着“留率”的变大, 居民生产积极性以一个恒定的加速度变大, 则可以得出有关生产积极性的等式:

$$\frac{Y_s}{Y_0} = k \times (1 - t)$$

其中, $k > 0$, 当 $Y_s = Y_0$ 时, $t = 0, k = 1$; 而当 $Y_s = 0$ 时, $t = 1$ 。将上述式子整理可得:

$$Y_s = Y_0 \times k \times (1 - t)$$

经整理可得政府收入：

$$Y_g = Y_0 \times k \times (t - t^2)$$

通过上式,我们可以发现,税率会对政府收入产生影响,当税率为 0 或 1 时,政府收入都为 0,说明税率不能过高或过低,必须适当,才能保证政府收入的稳定。

为了更形象具体地描述税率与税收之间的关系,下面用拉弗曲线(见图 1.1)加以补充说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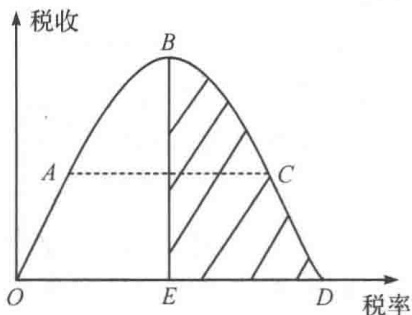


图 1.1 拉弗曲线

图中纵坐标代表的是税收,横坐标代表的是税率, O 代表原点,表示税收和税率都为 0,曲线 OBD 表示税收随税率变化的曲线,上面每一个点都对应一定税率下的税收。

点 E 表示最优税率, 对应的点 B 表示最多税收。当税率由点 O 变化到点 E

时,税收逐渐增多并在 B 点达到最高值,而当税率由点 E 变化到点 D 时,税收不增反减,并由最高值逐渐减少为 0。因此,税率并不总是和税收同方向变化,高税率也不一定代表高税收;税收随税率的提高增多,但达到最高值时,就会随着税率的提高而下降;当税率为 100% 时,税收为 0。如图 1.1 中所示,曲线与横坐标轴所形成的区域分为两部分,一为空白区域 $OABE$,表示税收与税率变化方向一致,为征税的“正区间”;另一为阴影区域 $EBCD$,表示税率与税收变化方向相反,也就是征税的“负区间”。故一定要选择“正区间”的税率来征税,而不应该选择“负区间”的税率来征税。如图中所示,点 A 和点 C 表示的税收收入是相等的,只是点 A 对应的税率比点 C 低,说明不同税率可以实现相同的税收收入。但是,我们还是宁愿选择较低税率来促进经济的增长,也不愿因为高税率而阻碍经济的增长,故而在选择税率时,一定要结合经济增长和税收两方面的因素,设计出最合理的税率,保证经济增长和税收同步变化。

经济景气指数来源于企业景气调查,是西方市场经济国家建立的一项统计调查制度。它是通过对企业家进行定期的问卷调查,并根据企业家对企业经营情况及宏观经济状况的判断和预期来编制的,由此反映企业的生产经营状况、经济运行状况,预测未来经济的发展变化趋势。

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包括:预警指数、一致指数(1996 年为 100)、先行指数(1996 年为 100)、滞后指数(1996 年为 100)。其中,一致指数是反映当前经济的基本走势,由工业生产、就业、社会需求(投资、消费、外贸)、社会收入(国家税收、企业利润、居民收入)等方面合成;先行指数是由一组领先于一致指数的先行指标合成,用于对未来经济的走势进行预测;滞后指数是由落后于一致指数的滞后指标合成,它主要用于对经济循环的峰与谷确认;预警指数是把经济运行的状态分为 5 个级别,“红灯”表示经济过热,“黄灯”表示经济偏热,“绿灯”表示经济运行正常,“浅蓝灯”表示经济偏冷,“蓝灯”表示经济过冷。

1987 年,吉林大学课题组与原国家经贸委合作,首次编制了全国宏观经济增长率周期波动的先行、一致、滞后扩散指数与合成指数。1988 年初,国家信息中心研制了我国最早的经济景气预警系统并投入试运行,到 1993 年,有近 30 个省、计划单列市开展了经济景气预警工作。90 年代中后期,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中国人民银行、国家信息中心、国家统计局、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吉林大学、东北财经大学等机构,致力于开展实用景气预警系统研究,使得宏观经济景气分析得到极大发展。2004 年,国家信息中心预测部开始公布宏观经济景气分析月度报告,国家统计局开始在《中国经济景气月报》上公布消费者信心指数、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和预警信号,中国人民银行开始发布企业调查、居民户调查和银行家调查数据及分析报告,并以此为基础进行经济景气动向分析预测。2005 年,国家发改委开始召开季度景气分析会,景气分析工作的交流活动走向制度化。目前,按月份发布的宏观经济景气指数,已成为研判中国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风向

标。表 1.1 给出了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的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数值。

表 1.1 2015 年 1 月至 2016 年 10 月中国宏观经济景气指数

报表时间	预警指数	一致指数	先行指数	滞后指数
2016 年 10 月	65.30	94.14	99.56	89.41
2016 年 9 月	65.30	94.22	99.46	89.24
2016 年 8 月	65.30	93.99	99.00	89.15
2016 年 7 月	68.00	93.98	98.80	89.24
2016 年 6 月	68.00	93.89	98.33	89.71
2016 年 5 月	68.00	94.19	98.41	89.97
2016 年 4 月	70.70	94.61	98.61	90.33
2016 年 3 月	70.70	94.33	98.94	90.51
2016 年 2 月	70.70	94.05	99.05	91.14
2016 年 1 月	70.70	93.69	98.75	91.57
2015 年 12 月	67.30	94.00	98.41	92.20
2015 年 11 月	67.30	93.99	98.12	92.46
2015 年 10 月	67.30	93.87	98.34	92.72
2015 年 9 月	67.30	93.78	98.28	92.75
2015 年 8 月	67.30	94.04	98.52	92.81
2015 年 7 月	67.30	94.51	98.39	92.64
2015 年 6 月	64.70	94.78	98.87	92.34
2015 年 5 月	68.00	94.72	98.75	92.57
2015 年 4 月	68.00	94.46	98.67	92.60
2015 年 3 月	68.00	94.93	98.54	93.36
2015 年 2 月	68.00	95.05	98.44	92.64
2015 年 1 月	68.00	95.00	98.80	93.14

第2章 税收政策影响制造业的机制及经验借鉴

2.1 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要性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这既是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容,也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客观要求。要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关键是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长期保持较快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1978年到2016年,我国年均经济增速达到9.6%,第二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更是高达10.9%。随着工业化快速推进,我国制造业规模不断扩大,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和世界制造业第一大国。截至2017年,在制造业31个大类、179个中类和609个小类中,完全对外资开放的产业和领域有22个大类、167个中类和585个小类,分别占71.0%、93.3%、96.1%。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制造业较高的对外开放水平和市场化程度。可以说,改革开放是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它加速了我国制造业发展的市场化进程,顺应了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与合作大趋势,为我国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奠定了雄厚物质基础。

在充分认识我国制造业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看到,尽管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但从制造业增加值率、劳动生产率、创新能力、拥有的核心技术、关键零部件生产、高端产业占比、产品质量和著名品牌等各方面衡量,我国制造业大而不强、发展质量不够高的问题十分突出,建设制造强国和发展先进制造业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一方面,我国制造业产业结构不平衡、高级化程度不够,低端无效供给过剩与高端有效供给不足并存。从具体制造业产品看,大部分产品的功能性常规参数能够基本满足要求,但功能档次、可靠性、质量稳定性和使用效率等方面还有待提高,高品质、个性化、高复杂性、高附加值产品的供给能力不足,高端品牌培育不够。另一方面,我国优秀制造业企业数量不够多,特别是缺少世界一流企业。我国制造业发展存在的短板充分说明,加快建设制造强国,必须大力提升制造业供给质量,推动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

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不仅是我国进入工业化后期的发展需要,